

社会学家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总第十四辑 2006.1

茶座

【沈原、郭于华、孙立平 本辑聚焦：转型社会的社会学】

【薛 涌 男同性恋——希腊民主之父（上篇）】

【韦明铤 “苏空头”——《浊世苍生》续写之一】

【曹剑波 女性主义知识论】

【郑也夫 贵族文化与大众文化（下）】

【潘天群 投票博弈与“帽子”——博弈论与社会】

【苏国勋 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之四】

【张 念 从女人的方向看】

【徐 军 克隆人与自我的危机】

荤面与素底

中国古代文体学中有“荤面素底”一说，最初被人们用于谜语。它的谜面都是软玉温香，情色缠绵。试举一例：“嘴儿亲，舌儿伸，双手尖尖搂抱子身。按着窍儿通口气，呜呜咽咽作娇声。”

这样的情色文字很容易让人想入非非，但它的谜底却是音色凄清淡远的古典乐器“箫”。后来，这一文体技巧也被拓展到散文方面。自表面上看来，这类文章似乎都是桑间濮上，不离衽席，实际上却意在彰显自家机智，而不在乎情色，其主题倒是异常严肃的。

史家陈寅恪先生当年也曾以“论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作为自己在燕京大学学术讲座的题目。当时不少沉浸在革命狂热中的知识青年，都闻而却步。直到几十年之后，钱钟书先生访美，还因此指摘陈寅恪先生“琐屑(trivial)”。

钱先生素以博学机智见称于世。这一次却未免看走了眼。他未曾看出，陈先生的这个题目不仅是“荤面素底”，而且还体现了史家“纳须弥于芥子”的高超技艺。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陈氏的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做“trivial”。陈先生给出的是一个“荤面”，却藏着一个“素底”，看似琐细，实则宏大。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能够养成见微知著，小中见大，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循环往复的能力是异常重要的。而社会学的洞察力，正建基于这种能力之上。

欧洲古典社会学大师，都是擅长这一惊人技艺的高手。从哲学到社会学，从宏大的形上学到微观的具体社会现象，他们自由往复，腾挪跳越，打通了一道道人为设置的学科建制的高墙壁垒。其学术理想，不是像美国那种分割琐细的标准化、量化的社会学，而是由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韦伯等人开创的古典社会学传统——社会思想的传统。按照思想史家休斯(H. Stuart Hughes)的说法，这一社会思想的广阔领域，不仅包含狭义的社会学，而且“还包含了哲学、心理学、历史与政治理论的某些层面等”。其最终目标，不仅仅是要开掘出具体社会领域中的隐微，而且要展现给人们更为宏阔的学术视野，更具整体性的关于社会的知识构架。在这种意义上，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只是“面”，而最终构建起体大思精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体系，才是他们真正的“底”。

王 焱

2006年4月12日

目 录

主 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助 理 王 萍
责任编辑 王海玲

卷首语 | FOREWORD

001 王 焱 荤面与素底

学术圈 | ACADEMICAL CIRCLES

- 004 薛 涌 男同性恋——希腊民主之父(上篇)
013 潘天群 投票博弈与“帽子”——博弈论与社会
016 张 念 从女人的方向看
019 曹剑波 女性主义知识论

聚 焦 | PERSPECTIVES

转型社会的社会学

- 023 沈 原 社会转型与社会学干预方法
029 郭于华 社会学的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
036 孙立平 探寻实践中的逻辑与机制

随 笔 | ESSAYS

- 042 唐晓峰 名分问题
047 李远山 说“同志”
051 戈 革 当中国还没有火柴的时候
055 邵 建 宽容与同性恋者的权利(外一篇)
059 王学泰 旧体诗一束(之二)
063 田 松 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
069 张立升 “道德”十札

社 会 | SOCIETY

- 073 韦明铤 “苏空头”——《浊世苍生》续写之一
080 郑也夫 贵族文化与大众文化(下)
084 王建军 城市化在文明跃迁中的枢纽地位
088 陈卫平 儒家礼乐文明与近代海派文明的互补
095 张 静 “素质”是制度规则调节的结果
098 刘 岩 刘 威 流浪乞讨:城市管理与社会救助之痛
103 夏 星 弗洛伊德与女权主义——回应王澄霞女士

社会思想 | SOCIAL THOUGHT

- 109 苏国勋 当代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之四
113 陈蓉霞 分工、交换与人类社会的进化

阅 读 | READING

- 118 于闽梅 闺阁深处的“礼仪之争”——我看《浮生六记》
125 姚 俊 从本土化研究到本土研究——另一种社会理论及其可能
130 吴万伟 编译 资本主义的基督教根源

世 相 | MASSES

- 132 徐 军 克隆人与自我的危机
138 肖 瑛 偶像是如何炼成的?——“超级女声”的社会学分析(下篇)
146 赵铁林 黄明芳 大刑出来的人们(下篇)——老北京话城南之七

资 讯 | INFORMATION

◇哲学已放弃宏大理论◇“后学术时代”的来临与“后学者”们的狂欢◇国人的手纸与
公共卫生服务◇明清取代大明的真正原因◇可怕的灰社会现象◇贫富差距源自“权
力掠夺”◇人类十大悲哀学科◇梦想的中国

封二 古希腊瓶画中的同性恋

男同性恋

——希腊民主之父(上篇)

薛涌*

读罢柏拉图的“会饮”，我曾对学生这样讲：“在古希腊，婚姻是男女之间的事，爱情是男人之间的事，男同性恋们为人类创造了民主。”

此话有夸张之嫌，却并不荒唐。不妨先讲民主。我们也许不能说民主是男同性恋们一手缔造的，更不能说没有这些同性恋就没有民主，不过，说男同性恋是民主之父，却毫不过分。至少，雅典人是这么认为的。

众所周知，古希腊是民主的发源地。这个发源地，更精确一些地说，就是雅典。不仅雅典在希腊世界代表着与斯巴达对立的政治与文化传统，而且希腊的古典遗产主要是通过雅典遗迹和文献记录留下来的。其他城邦，即使有民主制度，后世对之也不甚了了，因此很难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

讲起雅典的民主，人们必讲三个人：梭伦、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斯。梭伦是雅典的立法者，使雅典有了一个法治的根基。克里斯提尼奠定了雅典的民主制度。伯里克利斯则是雅典民主极盛时刻的政治领袖，其在阵亡将士墓前的讲演，是最早阐述民主价值的经典文献之一。不过，人们常常忘记了两个人：Aristogeiton 和 Harmodios。这两个人是一对同性恋人，为了爱情刺杀僭主，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被称为“弑君者”。在雅典人的心目中，他们才是民主之父。

要了解他们在雅典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必须看雅典人是如何记忆他们的。他们死于公元前 514 年。大概在 5 年后，即公元前 509 年，雕塑家 Antenor 就为这对恋人制作了一组雕像，竖立在雅典的中央市场 (agora) 中。这是雅典历史上第一次以雕像的形式来纪念历史人物（雅典的雕像大部分都是用来表现神而不是人）。而且在此后的 100 年中，他们的雕像是雅典唯一的历史人物雕像。在雅典，为任何一个活着的人立像都是亵渎神灵，亵渎民主。伯里克利斯统治雅典时督建帕台农神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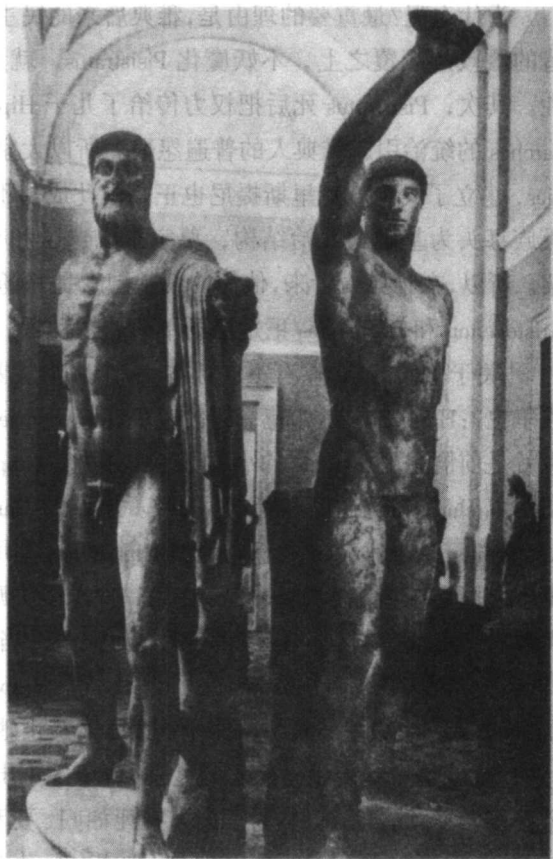
* 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其政敌就攻击他让所雇用的雕塑家把他的形象投射到神庙的一件雕像上，搞得他十分狼狈。Aristogeiton 和 Harmodios 死后 5 年就被这么供奉，可见他们在雅典公共生活中的地位远比任何一位政治家或其他公民要高，几乎成了半神式的人物。

而随着雅典民主的发展，安放 Aristogeiton 和 Harmodios 雕像的中央市场也日益重要，成为核心的公共空间，供公民们聚会讨论各种公共和私人问题。这组雕像也就成了雅典自由的象征，其地位即使是两千多年后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也无法相比。公元前 480 年，波斯王 Xerxes 在希波战争中一度率军占据雅典。他特别下令把这组雕像推倒，意在打垮雅典人的精神。但等雅典人获胜后，雕塑家 Kritios 和 Nosiotes 在公元前 477 年重新为这两位弑君者立起雕像。雕像的基座上镌刻着一行诗句：“当 Aristogeiton 和 Harmodios 杀死 Hipparchos（即僭主之弟，见下文）时，一道伟大的光焰照亮了雅典人。”

这一组新雕像幸运地保存下来，如今被视为希腊古典时期雕塑的代表作，在最普及的希腊艺术史中都能看到。不仅如此，Aristogeiton 和 Harmodios 被雅典官方尊奉。他们享有公共墓地，肖像出现在雅典的瓶画和货币图案上。每年雅典主管军事事务的首脑都会主持对他们的祭祀。到了伯里克利斯时代，他们的后人吃饭也可以由政府埋单。这在人人平等的雅典，是罕见的特权。

为什么 Aristogeiton 和 Harmodios 如此重要呢？我们不妨把他们和上述三位最伟大的雅典政治家加以比较。在梭伦的时代，雅典贫富矛盾激化，城邦出现生存危机。梭伦在公元前 594 年得到雅典人的特别授权，



Aristogeiton 和 Harmodios 的雕像

立法改革,缓解社会矛盾。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梭伦改革”。这次改革虽然开启了民主的先河,却并未建立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制度。雅典人被梭伦按财富分成四个等级,要按等级决定每个人出任公职的资格,穷人几乎没有机会。而且梭伦自己也知道他为雅典作的政治安排只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并无长久效力,所以立法后就出游了。后来雅典果然陷入动乱,最后终于在公元前 546 年导致了僭主 Pisistratus 的上台。

Pisistratus 名为僭主,或称暴君,实际统治并不暴戾。他关注下层人的利益,为他们提供公共福利,同时也为雅典建设了基本的政府结构与公共设施。在他治下,雅典空前强大。最近史学界对他评价颇高。他实际上是被后来的雅典人给妖魔化了。

为什么呢?最重要的理由是,雅典后来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对 Pisistratus 所创造的僭政的颠覆之上,不妖魔化 Pisistratus,就无法有效地建立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其次, Pisistratus 死后把权力传给了儿子 Hippias。这位 Hippias 和其弟弟 Hipparchos 的统治引起雅典人的普遍怨恨。所以大家最后揭竿而起,驱逐了僭主 Hippias,建立了民主。克里斯提尼也正是由此成为雅典人的领袖,彻底改革了雅典以氏族寡头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奠定了以选区和平等的公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在雅典人看来,他们的民主制度是一场推翻僭政的革命的直接结果。而 Aristogeiton 和 Harmodios 正是这场革命的发动者。

关于他们的故事,有不同版本。一个版本主要来源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Harmodios 是如花一样的美少年。Aristogeiton 是他年长的恋人。Hipparchos,也就是前僭主 Pisistratus 的小儿子、当朝僭主 Hippias 的弟弟,也是个同性恋。他试图诱惑 Harmodios。第一次诱惑失败。忠诚的 Harmodios 把事情告诉了自己的恋人 Aristogeiton, Aristogeiton 大怒。他怕 Hipparchos 利用权力抢走自己的情人,就开始密谋推翻僭主统治。而 Hipparchos 在第一次求爱失败后,再度向 Harmodios 示爱,再次失败后恼羞成怒,就拿 Harmodios 的妹妹出气。当时雅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仪式,叫泛雅典娜庆典(Panathenaic procession)。Hipparchos 利用自己的权力,先邀请了 Harmodios 的妹妹在庆典中捧篮子,然后又禁止她参加,说她缺乏这个仪式需要的品格,也就是意味着她已经不是处女,属于嫁不出去的贱女人。Harmodios 大怒,执意报复。Aristogeiton 自然为了恋人视死如归,要和 Harmodios 一起在这个庆典中刺杀 Hipparchos 和僭主 Hippias。但是,在这次行动中,当他们看到一个同谋和 Hippias 亲切交谈时,觉得自己的计划败露,于是莽撞行动。Harmodios 冲在前面,砍杀了

Hipparchos, 却未能接近僭主 Hippias。Harmodios 当场被僭主的保镖杀死。Aristogeiton 侥幸脱逃,但很快被抓获处决。三年后,雅典人揭竿而起,推翻了 Hippias 的僭政。

实际上,雅典民主的形成远非这样简单、浪漫,Aristogeiton 和 Harmodios 对推动民主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如果说他们对历史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僭主 Hippias 在他们行刺之前,统治还是相当温和的,而且颇为“亲民”,许多老百姓可以随意和他交谈,但此事之后,他大概有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心态,统治变得愈加严酷,草木皆兵,引起普遍怨恨。雅典最有影响的 Alkmaionids 家族借机贿赂特尔斐的祭司伪造神喻,建议斯巴达出兵清除 Hippias。于是 Alkmaionids 家族与斯巴达联手行动,一举推翻了僭主的统治,驱逐了 Hippias,给了民主一个关键的机会。

然而,历史总是要过河拆桥。雅典人在这方面尤其健忘。在赶走僭主之后,克里斯提尼在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变成了雅典的领袖。他的改革彻底改变了雅典的政治版图和雅典人的自我意识。在他之前,雅典的政争基本上是几个统治家族的斗法。这些大家族,都以地域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其地盘内的居民很难逃脱这些大家族的影响。这种政治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说是寡头。比如克里斯提尼本人就是雅典最有影响的一个大家族 Alkmaionids 的领袖,否则也不可能上台。克里斯提尼不愧是位政治奇才。为了打破大家族对雅典人的控制,他把各地域的雅典公民混合组成不同的选区。这样,由于选区里的公民来自不同地区,大家族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通过控制附近的居民而影响政治。雅典公民的认同也摆脱了狭隘的地方主义,直接效忠城邦。选民政治由此开始,国家意识也渐渐成形。

当雅典的民主成形后,雅典公民的历史记忆也不得不符合他们的政治信仰。雅典公民的基本政治价值是人人平等,大家当然不愿意承认当年推翻僭主的是一个抑制公民平等的大家族。同时,斯巴达在帮助雅典推翻僭主后,几乎立即成为雅典的对手。

克里斯提尼的政敌、雅典的旧贵族 Isagoras 就曾勾结斯巴达国王 Cleomenes 出兵干涉雅典的民主进程,被雅典人驱逐。在希波战争后,斯巴达又成为雅典的头号敌人。雅典人自然不会把斯巴达人对民主的贡献写进历史。简单地说,雅典的大家族和斯巴达,作为当初驱除僭主的主要力量,后来都不容于雅典的民主,需要从雅典的历史荣光中清除出去。也正因为如此,Aristogeiton 和 Harmodios 就被神话为民主的缔造者。他们是雅典公民,不是外国人。他们的行动是公民的个人行为,不依附于任何家族势力。把他们刺杀僭主描绘为伟大的“民主时刻”,雅典民主的诞生

就不仅属于雅典,而且也是属于公民的。这也正好契合雅典后来的政治理想。

不过,任何神话,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对现实产生影响,本身变成一股强大的历史力量。Aristogeiton 和 Harmodios 的雕像站立在雅典的中心市场,确实变成了雅典民主的守护神。人们每天从雕像下走过,看着两位英雄国父拔刀以待,随时准备行动。特别是年轻的 Harmodios,高高扬起手中的刀,告诉所有心怀僭主野心的人:我们任何一个雅典普通公民,都会随时把追逐绝对权力的人砍倒在地!每天从这口刀下走过,那些权力欲膨胀的人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所以,Aristogeiton 和 Harmodios 的雕像在雅典政治中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和威慑力量,提醒公民对绝对权力的警惕,抑制了野心家的权力冒险,使 Pisistratus 通过政变成为僭主的事情很难再发生。

不过,Aristogeiton 和 Harmodios 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尊崇,还和他们坚贞不渝的爱情密不可分。性爱与民主,在雅典人那里有着特别的关系。这里的文化底蕴,也是我说男同性恋是人类的民主之父的理由。这一点,还需下文论述。

男人之爱为什么胜过男女之爱

一对男同性恋,阴差阳错地被奉为半神式的民主之父,这不仅说明了雅典的政治文化,也说明了其性爱的文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类历史中,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是最崇尚同性恋的社会。

看看古希腊的文献,男同性恋们无所不在。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古希腊的男同性恋在人口中的比例是否特别高?古希腊人生理上的性机能是否与其他社会中的人不同?老实说,这个问题无人可以回答。因为依据现有的文献,对雅典的人口也只能估计个大概,我们根本不可能作这种需要诸多细节史料的研究。不过,从常识上判断,雅典人和我们现代人在性取向上大致没有太大不同。举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和斯巴达正打得难解难分,阿里斯托芬在雅典上演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反战喜剧。其中讲到雅典的妇女因为厌战,要求自己的丈夫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她们最终使用的看家本领,就是“罢性”:只要丈夫们不停战,她们就不上床。不仅如此,她们还和敌国斯巴达的妇女联合起来一起“罢性”。结果,因为打熬不住自己的性需求,雅典和斯巴达的男人们终于接受了停战协议。

这种讽刺时政的喜剧,固然不能当做历史事实。但是,这样的喜剧要有观众,

必须根据人们日常生活的常识来写作。这里反映的现实是,异性恋还是社会的常规,是绝大部分人的性取向。否则,女人一“罢性”,男人就可以在兵营中彼此寻找性伴侣,“罢性”岂不正好成全了人家?可见,男同性恋的流行,不一定说明古希腊人在生理上的特异之处,其表达的是一种文化时尚。

在古希腊,异性恋不仅是主流的性取向,而且有时还被许多城邦国家(如斯巴达)强制施行,比如男女到一定年龄就必须结婚、生孩子,否则受惩罚等等。因为维持基本的出生率,是一个城邦生存下来的前提。问题是,希腊社会是个绝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妇女属于低一级的人类,和女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也就不具有什么文化上的价值了。在许多情况下,妇女就是个生育的机器,婚姻就是个制造人口的车间。

也出于同样的理由,女同性恋虽然也颇为常见,女诗人萨福还为此留下了动人的诗章,但社会对之容忍却不一定推崇。

男人不同。男人是公民,有政治权利,而且打仗时冲锋陷阵,是城邦的守卫者。男人之间的感情,也由此变得神圣起来。我个人认为,男同性恋体现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感情纽带,符合雅典的政治和文化理想。这是其受推崇的根本原因。

这一解释,当然会面临许多挑战。因为雅典的男同性恋多是在成年男子和十几岁的青少年之间发生。雅典的男公民常常在一起赤身裸体地进行军事和体育训练。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大运动量训练后,即使人体极度疲乏,性欲却高于平时。这当然给同性恋行为提供了场所和刺激。男孩子刚刚加入社会,一般跟着成人进行训练。到了战场上,初生牛犊也需要些有经验的长者照顾。所以,他们和年长些的公民特别是教官,就容易发生感情和性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当然也有权力因素。特别是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那些长者是求爱者,少年则扮演“猎物”的角色,常常要对这种追求进行一定的抵抗,使得整个过程变得更加刺激。这种性趣味,当然不是平等的性关系了。

不过,比起男女之间的性爱来,毕竟这种不平等要表面得多。因为男女的优劣是由生理规定的,无法改变。两个男性,虽然一个是成人,一个是少年,毕竟大家都是公民,都拥有政治权利,大家不过是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在社会上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已。

这种角色会随着年龄和事业的变化而变化。人生阶段的不同不能掩盖作为人的实质性政治平等。成人的男性,一方面追求美少年,属于求爱者,一方面负有帮助这个少年完成社会化的过程,特别是引导他进入性爱的世界的责任。一般地说,

一个成年男子对一少年倾心后,就展开一系列追求的过程。这是一种公开行为。他可以访问少年的家长,表达对他们儿子的爱慕,并给少年买礼物,等等。许多家长也希望孩子有这么一个保护人,帮助他度过青春期,在战场上受到些关照。不过,等少年长大后,社会上基本的期待是这种关系将中断,少年长大成人后将结婚。同性恋等于起到一个引导少年进入异性之性爱的桥梁作用。同时,他作为成年人,在家庭之外也可以开始追求下一代的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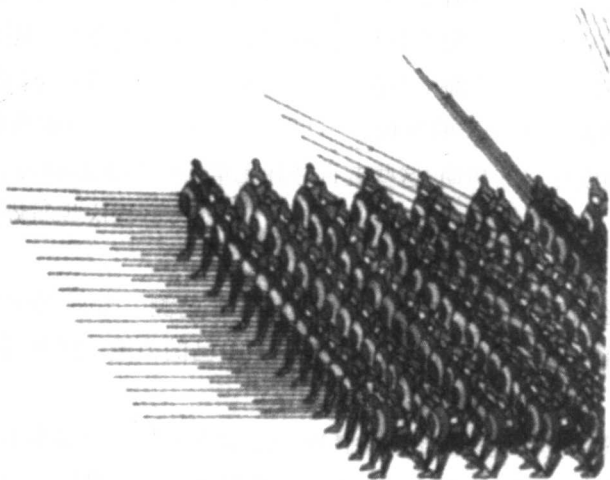
对于一个没有同性恋倾向的人,随着社会的时尚经过这样的过程,然后成家立业,未必会再染指同性恋。但是,真有同性恋取向的人,恐怕就很难在成人后和旧恋人一下子切断关系了。这时双方的性爱,就变得相当平等了。在柏拉图的《会饮》中就讲到了这样的事情,不是老的追小的,而是反过来,小的追老的:雅典的将军 Alcibiades,一个苏格拉底年轻的仰慕者和学生,狂追苏格拉底。两者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

这个平等的关系特别体现在战场上,同性恋之间的感情具有高度的军事价值。比如《会饮》中就公开说,由男同性恋组成的军队是最为无坚不摧的。因为一个人在自己的恋人面前,总要最大限度地表现出自己的英武,视死如归,绝不会临阵脱逃。恋人的目光,比什么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都管用。同时,恋人之间的生死与共是军队中战友之间的理想关系,没有人会丢下自己的恋人不管,大家都以性命相托。Aristogeiton 和 Harmodios 之间的爱情所显示的,也正是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关系中没有等级观念,大家互相为对方牺牲自己,根本不会出现什么“让领导同志先走”的上下尊卑意识。

要理解这样的平等关系,必须看看雅典的军事制度以及这种制度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城邦时代的古希腊,在“国际秩序”方面颇似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因为没有统一的政权,战争成了家常便饭,打仗也成了男性公民的主要职责。希腊人打仗,主要是靠其“方阵”,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战法。组成方阵的步兵,全由重盔甲装备。前排士兵手持硕大的盾牌和短刀,盾牌紧密排列,形成一堵结结实实的防护墙;后排士兵使用长矛,从盾牌的缝隙中伸出去攻击敌人。这样紧密集合的方阵,进可攻,退可守,如同一个由人组成的小坦克。后来雅典人之所以能够在马拉松击败数量庞大得多的波斯帝国的大军,也多亏了他们优良的铠甲和这种高度理性化的方阵。

不过,这种方阵的运作需要建立在人人平等的高度纪律之上。每个士兵都是方阵的一个部件,离开方阵无法单独起作用。大家必须严格地共进退、共生死,彼

此以命相托,任何人的位置都是一样重要的。将领虽然身份高出普通士兵,但角色非常有限。除了在战前选定地形,下达攻击命令外,只要战斗一打响,他的作用和普通士兵几乎没有区别,要忠实地作为方阵的一个部件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也难怪古希腊人打仗,将领的伤亡率非常之高。公元前 7 世纪的诗人 Archilochus 曾经这样歌颂理想的方阵步兵(在希腊称为 hoplite):“一个男子短粗的躯干结结实实地坐落在他的双腿上,心中充满了勇气。他的腿像树根一样扎在地上,谁也别想把他从那里拔出来。”



古希腊步兵方阵

这种方阵把个人的品质和城邦的公共精神完美地结合起来。首先,方阵虽然强调集体,但这个集体的运作要靠优良个人素质。作为方阵的步兵,你必须有视死如归的勇气,才能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退缩。另外,方阵步兵的铠甲重达 60 磅。雅典步兵在马拉松就扛着这身铠甲,和具有绝对优势的波斯大军苦战一天,打赢后马不停蹄地进行 20 多英里(大致是一个马拉松比赛的距离)的急行军回到雅典防守,阻止了波斯军队乘虚而入。《三国演义》中挥舞 82 斤重的青龙偃月刀的关云长,对于缺乏尚武精神的中国读者来说,已经是夸张到了不可信的地步。但在真实的生活里,每个雅典步兵都必须有负有如此重甲进行马拉松式的拼杀的素质,每个人都相当于一个现代的十项全能运动员。所以,希腊人除了打仗,就是进行体育训练。城邦的生存,建立在这种超人的个人素质之上。

另一方面,这种个人素质只有在方阵中才能实现。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一个人离开城邦,几乎就不成其为人了。这一点,看看希腊方阵就能明白。方

阵培养着人人平等的共同体精神，培养着希腊人的政治本能。许多历史学家曾认为方阵的士兵构成了雅典民主的基石。因为方阵是一个城邦存活的基础，方阵士兵中人人平等的关系，使少数人控制政治权力变得不可能。雅典的民主，甚至被形容为是一场“步兵革命”的结果。

要用史料证明这一民主起源论非常困难，而且这一方阵造就民主的假设也面临着理论上的困难：怎么来解释在步兵以外的穷人也获得了投票权？要知道，希腊军队铠甲之精良是有名的。方阵士兵的武器并非国家配置，而是士兵自办。能够负担得起这么精良的铠甲并且有空闲进行这么职业化的军事和体育训练的，自然都是比较富裕的家庭的子弟。穷人有机会在军队中扮演重要角色，还是在希波战争之后。那时雅典崛起为一个海上帝国，修建了庞大的舰队。船上需要大量的水手，这正好吸收了雅典无事可干的贫民，结果这些水手日后成为雅典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在民主制度建立的初期，这些老百姓并无重要的军事影响力。如果真有“步兵革命”的话，为什么那些出身富裕家庭的方阵士兵也给这些弱势的穷人带来了政治权利呢？

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些猜测。比如，步兵们在和上层寡头们或者僭主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刻，需要扩大自己的力量，到下层寻找额外的支持者。

寡头们和僭主其实也是如此。僭主 Pisistratus 不正是一个根本不“暴”的亲民君主吗？所以，“步兵革命”未必不可以通过许诺给下层老百姓以平等的政治权利来建立政治联盟，最后推翻寡头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在雅典早期，即使有明显的“民主化”进程，精英阶层还是主导力量。比如前文提到的梭伦改革，还是没有赋予下层平等的政治权利。步兵作为城邦的一个核心阶层，对塑造整个城邦的政治文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步兵中培养的平等精神最后形成了雅典城邦政治的游戏规则和文化时尚，也就不足为怪了。男同性恋恐怕也就是这样成为雅典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的。

投票博弈与“帽子”

——博弈论与社会

潘天群*

社会是由各种“游戏”所组成,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游戏”之中。这里所谓的“游戏”即“博弈”。

社会设计了很多“帽子”,这些“帽子”是为我们准备的,那便是我们常说的“头衔”。例如,官场有各种“长”——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学位有各种“士”——学士、硕士、博士,工程界有各种“师”——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这些“帽子”是有光环的。还有许多谁也不愿意戴的“另类帽子”,如“贪污犯”、“贼”,改革开放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古代,囚犯的脸上曾被烙上特殊的标记,当今的这些另类“帽子”是现代社会为另类人准备的标记,戴上这些另类“帽子”的人的身份也比正常的人要低,获取资源的量不如正常人,更不能与戴着光环“帽子”的人相比。

我们的这些“帽子”是在博弈中获得的。

任何社会都要设计各式各样的“帽子”：“好”的，“坏”的；“高”的，“矮”的……这样社会才会有序；通过“帽子”，人被分成所谓的三六九等。

社会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多“帽子”？答案是，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而决定获取资源多少的是不同级别的“帽子”。

“帽子”是社会性质，它有别于自然属性。我的性别、身高、体重等是自然属性，它们是自然给予我的，对于这些性质中的大多数，我是无法改变的；但社会性质则不同。这些性质既然是社会设计出来的，我可以通过我的能力或活动获得这些“帽子”，当然要获得好的“帽子”。

社会给我们戴“帽子”的过程是在一系列博弈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同时也是不可缺少的博弈是，某个权威组织所进行的群体决策。这个权威组织是由一群人组成；在特殊情况下，这个组织是由某一个人所组成。

* 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是博士”，“我是教授”……“博士”、“教授”等是社会性质。我天生不是博士，我所受到的一系列被认可的教育以及博士答辩委员会以及相关学位委员会的投票表决，使我成为博士。同样，我天生不是教授，我成为教授，是因为某年某月某日，几个所谓专家根据我的“表现”所进行的表决使我具有了“教授”的性质。在这些一系列博弈中我是当然的博弈参与者。

“帽子”是由特定组织将之赋予社会中的成员。一个盖有某个组织部门的公章的“红头文件”使某人成为“某某长”；某个权威部门颁发的证书将使某人成为“教授”、“博士”。而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个红头文件、颁发某个证书，是某个社会组织的决策过程使然。社会组织赋予某个人社会属性的过程是一个投票博弈的过程。

社会需要运行，群体需要决策。投票博弈便是一个群体决策的过程。在一定规则下，某个群体根据其成员的投票或表决而得出决策的过程往往是通过投票来进行的。投票博弈是一种特殊的博弈，这是根据群体中成员的偏好而形成群体偏好的过程。美国总统选举是投票过程，我国决定建造三峡大坝的决策也是一个投票过程。

为什么应当由集体进行决策而非个人？或者说，集体决策为什么比个人决策要优？理由大体有两个：第一，在很多情况下，社会需要集体行动，由于这些集体行动涉及群体中各个人的利益，在群体应当如何进行许多的决策上应当“考虑”每个人的意见；第二，由于个人理性的局限，群体决策可以克服个人的这种局限。当然一项决策由群体进行决策而不是个人也有缺点：群体决策是低效率的，既费时又费力；另外，正如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的，群体决策的理性得不到保证。

投票博弈(voting game)是博弈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个领域集中了大批学者，许多学者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美国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夏普里(L. Shapley)教授与舒比克合作，在1954年给出了一个计算委员会中各成员权力的方法，被称为夏普里—舒比克权力指数(本人大胆预测，若诺贝尔经济学奖还考虑博弈论专家的话，夏普里将是下一个最有可能获奖的博弈论专家)。根据夏普里与舒比克给出的方法，群体中成员的权力是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实数，两个极端的情况是，独裁者的权力指数为1，无任何权力的决策者的权力指数为0。

人们获得“帽子”是组织进行决策的结果。你会说，一个组织中的人在投票时是根据某个标准来进行的。但存在所谓客观的标准吗？不存在！任何标准都是人指定并由投票者掌握的，无论这个投票者是普通大众还是所谓专家。

那么，投票者根据什么决定某个人能否获得某个“帽子”呢？这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某个决策过程中人们是如何进行决策的?这是实证的社会学要研究的问题;第二,人们应当如何进行投票?这是规范的伦理学要研究的问题。

在实际投票中,专家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这个利益是所做出的投票决策不要给他带来损害,也就是他要将自己的工作做好。那么当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投票者能否做出利己的决策呢?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

正因为如此,实际社会中的人们花“工夫在诗外”。为了获得“高帽子”,某些人想方设法贿赂投票者,尤其是那些起决定性作用(即权力指数大)的投票者。这种现象在学场上有之,各个高校争相“跑点”(硕士点、博士点)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官场上有之,官员们向上级部门或上级领导跑官要官也是人所共知的现象……

我想起了一句流行的对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它形象地刻画了“戴帽子”的博弈过程。说你“行”或说你“不行”的是谁呢?是社会中的组织,或严格地说,是组织中的各个投票者。你本身的能力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投票者“说”你“行”还是“不行”。

这个流行的对联还有一个横批:“不服不行”。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必须“服”它——正视它,因为社会就是这么运行的,不存在脱离具体决策者的所谓“公正”。若我们不服,拒绝参与到“游戏”之中,社会将不带我们“玩”,我们将被社会抛弃。

抽象的“公正”是不存在的,“公正”是在博弈中实现的,即所有的所谓“公正”是一系列博弈的结果,最终是体现在具体组织的决定或群体决策之中。我常根据个人的经历规劝遭受挫折的朋友和学生正确对待博弈结果,若遭受到“不公正”,那是正常现象,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均要与社会“合作”,即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到各种博弈之中。当然这里的“合作”不是说去跑关系、走后门,而是在遵循道德规范的条件将这样的博弈“合作”地进行下去。

对于社会而言,如果没有严格的“游戏”规则对投票者进行规范,这样的游戏将是变了味的游戏,其结果对社会是有害的;而对于游戏的参与者,无论是给他人戴“帽子”的决策者,还是需要“帽子”的人,若不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的社会将是可怕的。

从女人的方向看

张 念*

1903年,晚清帝国风雨飘摇,一个叫金天翮的男性知识分子,更准确地说是士大夫,写了一本《女界钟》的书,对女权问题做了最早的系统的论述,这大概是第一个着重从女人的方向去看世界的男人。那么这个男人看到了什么呢?他的结论是:男人没有解放,那么女人永远是男人的奴隶。作为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这里说的“男人”一词,可以替换成国家和民族。当然,在家国忧患、民族存亡以及现代性想象的宏大目标之下,女人解放是作为一个副题呈现出来的。在金天翮的新女性蓝图中,“红袖添香”与“思想发达”,“诞育佳儿”和“完全天赋之人”理所当然地交融在一起,“天赋”启蒙理念就这样奇怪地长在一个旧式男文人的心里。而所谓的“女人解放”,作为前现代与现代的精神分裂并发症,刻写在了一个时代的躁动中。从一开始,关于现代新女性的糊涂账目所落下的病根,一直潜伏在自由与平等如此漫长、艰难而复杂的制作过程之中。男与女、国家与个人、东方与西方如何相遇,看起来,像时间的秘密一样,深不可测。

“女人解放”已经说了100多年,显然成了一句神经质的呓语。呓语和咒语本来就具有相关性,如果我们要诅咒一个女人,我们就去让她解放。同样,如果我们要诅咒一个社会,我们就去让它开放。现代性这本难念的经,像溃疡伴随着口腔一样,使得我们词不达意,语焉不详。而解放与开放,在没有足够的准备之前,命运一样的降临了。在这样的一个被动句式里,有的欢欣鼓舞,有的惊慌失措。在现代性转型之初,欢欣鼓舞的是极少数知识女性,她们从学堂回来,就吵着要废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到了1949年之后,这样的反叛再也不需要了,尽管单位制度是家长制的延续,但女人们发现,我突然可以当人大代表了,我突然可以离婚了,我突然可以去上班了。在“男女平等”的极限状态下,还出现了引领时代风骚的“铁姑

* 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讲师。